

战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留学生的入学动机考察

杨 驹 （广岛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

【摘要】本研究关注近代中国留学生的留日经历，以尊重留学生的主体生活体验为前提，试图从留学生的个人经历来重构当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战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历史，以田汉、吴玉德以及钱歌川三人的留学体验为案例进行分析，主要考察他们东渡日本和入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动机。通过分析他们的回忆录以及文章，本文发现他们的留学决策深受国家层面的政策以及家庭成员的建议的影响。

此外，他们入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完全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一看似理性的决策背后事实上反映了中国留学生入学时主体性的缺失。

【关键词】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生；入学动机；留学经历

一、前言

在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研究上，实藤惠秀无疑开创了一种范式。在其所著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中⁴⁷，大量的日方一手资料的运用使得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而实藤惠秀的这一研究的有趣之处不仅仅是对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史料方面的补足，而是对于自舒新城（1927）以来的近代中国留学史研究的一种视野上的超越。也就是，中国人留学史不仅仅是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更是外国接收中国留学生，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实现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说，实藤惠秀的跨文化交流的研究视角打开了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新篇章。关于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所带来的对中国近代化所产生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受到了关注。然而，在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视角之下，一些关于这段历史更加具体的方面也渐渐得到关注。例如，研究的对象为中国留日学人中的女性留学生群体（周一川 1997, 2007）⁴⁸，或者为中国人留学日本时的教育机构（二見剛史 1978a, 1978b）⁴⁹。这些研究不仅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提供了更加详实的史料，更是对中国留学生留学于日本的留学背景的回归。正如叶隽在 2007 年出版的《留学史丛书》的总序中所指出的，“留学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留学背景，舍却对其留学经验的深入

⁴⁷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増補版)』くろしお出版 東京 1970。

⁴⁸周一川「中国人女子留学生を受け入れた官立三校について」『史学』1997(67) 第 161-186 頁；『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2007。

⁴⁹二見剛史「戦前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予備教育の成立と展開（アジアにおける教育交流—アジア人日本留学の歴史と現状）—（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教育交流—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留学）『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1978a(94) 第 61-80 頁；「第一高等学校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教育（旧制高等学校に関する問題史的研究）」『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1978b(95) 第 193-207 頁。

考察，则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无从呈现。”⁵⁰

有鉴于此，本研究关注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教育机构的留学经历，试图通过留学生的个人经历来探索在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体来说，本文将聚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上，对他们进入学校的动机进行分析。通过三个个案分析，分析其入学动机是否存在共性，以及入学动机背后的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本文将着重于分析中国留学生的日记、回忆录、文章等资料。此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志等官方史料也会被使用到。

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以及相关研究综述

（一）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为“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成立于明治5年（1872年），是日本第一所专为培养小学教师所设立的教育机构，1873年改称为“东京师范学校”。1886年，日本颁布《师范学校令》，东京师范学校改称为“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全国第一所官方专门培养中学教师的教育机构。1902年，全国第二所官方培养中学教师的机构在广岛成立，为了区别于广岛的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改称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⁵¹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直是日本政府培养教师的主要机构，在日本战前的师范教育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志上可以得知，从明治47年（1908年）开始，东高就开始有中国籍的毕业生。截止至1937年，共有421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⁵²这些毕业生被认为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志江（2000）指出，“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教育界，特别是在高等师范教育界，很多东京高师的毕业生作为精英在活跃着。”⁵³

（二）文献综述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虽然是日本战前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主要机构，然而其注重学术训练而轻视专业训练的教学特征以及其闭锁性一直以来都遭到了批判（寺崎1970，船寄1998，山田2006）。尽管在这些研究中，高等师范学校的功能被广泛地探讨，然而正如山田（2006）所说，高等师范学校内部的教育过程并没有得到充分

⁵⁰叶隽《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9 第3页。

⁵¹東京文理科大学・東京高等師範学校『創立六十年』東京文理科大学 東京 1931 第61頁。

⁵²据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志进行整理，参考来源：東京文理科大学『東京文理科大学・東京高等師範学校高等師範学校一覽』東京文理科大学 東京 1939 第361-374頁。

⁵³經志江「明治末期東京高等師範学校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教育の成立」『教育学研究紀要』2000（46）第174頁。

的研究。⁵⁴

具体到关于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的研究，经志江以及邵艳等对诸如中国人留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历史渊源，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对外国留学生的政策，以及学校教授的科目等进行了介绍（经志江 2000；邵艳&船寄 2003）。这些研究使我们了解到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概况。然而，关于这段历史，仍然有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并未得到分析与解答。例如，为何这些中国留学生选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而不是其他的学校进行学习？留学生的入学体验如何以及就读体验为何？以及这段留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经历对这些留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

为了逐步解决在以往的研究中遗留的问题，本文聚焦于中国留学生留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经历，具体分析留学生东渡日本以及入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动机。

三、留学背景：国家行为上的宏观影响

（一）中国政府：学“师”于日本的迫切性

早在中国政府正式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培养中国师范生之前，中国学生已被大量派出到日本接受速成师范教育。在中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之初，政治改良派认识到为新的学校制度输送教师的重要性。在 1898 年，改良派上书给清朝皇帝，建议朝廷应该派遣学生到日本并委托日本对其进行师范教育。⁵⁵考虑到全国范围内对新式教师的需求，改良派提出在短期内完成师资培训的方案，也就是“速成师范”计划。这些提议被采纳并在全国范围内传开。此后，上千的中国学生来到日本并接受了速成教育课程。日本方面也相应地建立了一些专门为中国人开设的教育机构。尽管速成师范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教师短缺的问题，但是这些短于一年的速成课程由于其成果质量问题遭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在 1906 年，时任中国清廷驻日本大使的杨枢，在上书给皇帝的奏折中表达了他对于速成课程的担忧。⁵⁶在这之后，清廷改变了留学生派出政策，取消了速成师范计划并开始推进师范教育的高等教育化。

（二）中日政府的合作：“五校特约”下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当然，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留学生所实施的速成教育并不仅限于师范教育一支。但是速成教育整体所显现出的弊端已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为了提高留学生的培养质量，驻日大使杨枢积极寻求日本官方的帮助，力求日方的高等院校能够定额接收中

⁵⁴山田浩之「高等師範学校生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戦前期日本における中等教員像の形成」松塚俊三、安原義仁編『国家・共同体・教師の戦略：教師の比較社会史』昭和堂 京都 2006 第 179-180 頁。

⁵⁵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1991 第 324 页。

⁵⁶杨枢〈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1991 第 372 页。

方派出的留学生。⁵⁷

1907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关于日本高等学校以及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官方协议。简而言之，根据这项协议：1) 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以及千叶医学校等五所高等学校每年将接收165名中国留学生；2) 一旦中国留学生通过这五所学校的其中一所学校的入学考试，即可获得来自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支持。⁵⁸ 五校特约被视为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签订的重要合约，因为它不仅是两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涉及教育方面的官方合约，而且在它存续的15年的时间里培养了上千名接收高等教育的中国留学生。

作为五校特约中唯一一所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无疑承担了培养高质量的中国师范生的主要任务。根据协议，从1908年到1923年这15年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每年将接受25名官派中国留学生。⁵⁹

四、个体决策：留学日本与入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一) 留学日本

清朝末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社会向上流动的途径发生了转变。新学的兴起以及清政府的鼓励使得留学成为实现社会流动的新途径。张之洞的《劝学篇》更是使得留学日本成为一种潮流风向。本文选取1910年代以及1920年代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3位中国留学生为案例，分析他们东渡日本的动机以及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动机。

1. 田汉的留学动机

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湖南人。田汉于1916年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文学系进行学习。1922年回国后先在长沙中学工作，后前往上海发展。曾任上海艺术大学的教授。田汉在中国最为家喻户晓的是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的身份。然而，作为近代中国戏剧的奠基人，田汉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更加引人注目。

田汉并非出生于富有的家庭。田汉的父亲是农民，去世时田汉仅9岁。田汉父亲去世后，家境变得越发困顿。⁶⁰ 田汉的舅父易梅园成为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1916年，田汉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他的舅舅决定将他带到日本并期待他能够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对于田汉而言，能够求学于日本是天大的“好消息”。在田汉的作品中，记述了他决定到日本留学的经历：

民国五年秋，我在长沙师范毕业，许多朋友都打点去当教员，我算是特别幸福，可以不必到教育界去“竞存”，却有到外国去继续读书的机会。因

⁵⁷杨枢之日本游学计划书//刘真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一册)》国立编译馆 台北1980第394-426页。

⁵⁸学部奏咨辑要//刘真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一册)》国立编译馆 台北1980第324页。

⁵⁹据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志记载，每年接收的中国学生数有所不同，并非严格的25名。

⁶⁰张向华编《田汉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1992第1-10页。

为我的三舅父梅园先生被任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要带我到东京去进高等学校。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后，赶忙和家人一起清检行李预备起程，又跑到那些相契的朋友那里去辞行。我动身前的几点钟还在铝铸嘉兄那里呢，随后回家别了母亲，兄弟，舅母和已有婚约的漱瑜，随着三舅父于八月一日晚搭沙市轮动身。我这时心里充满了小孩子的欢喜，充满了宗悫式的雄心，充满了诗人的想象，毫不觉得“别”这字含着何等深刻的意义。这时我第一次离开长沙。

（田汉《离乡的滋味》1936第170页）

可以看出，作为直接涉及留学日本事务的人员，田汉的舅父的资助与鼓励是田汉到日留学的直接原因。

2. 吴玉德的留学动机

吴玉德（1900-1985），福建人。吴玉德于1919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文学系，1924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在福建第八中学工作，曾任福建省龙溪县教育局局长等职。

吴玉德在回忆自己的留学经历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留学日本回国后的出路以及留学时的官费支持是他以及他的同伴们决定前往日本的直接原因：

我是民国8年（1919年）毕业于省立第八中学旧制四年丁班，受到前几届毕业生多人外出升学的影响，对出门深造颇具雄心，父亲认识时代潮流所趋亦甚赞成，加上班上杨维铨（杨骚），戴阳光志趣相同，时相鼓吹。因为当时漳州已有过陈智君（陈亮），林者仁（袖湖），许敦谷等留学日本；在社会上大有名望，正在日留学的还有长泰刘铨，陈云裳，都是家庭所熟谙之人，这是促我后来留日的主要因素。……留日派在我国军政各界的声势大，并不逊于留学欧美，而且费用较省。据此，我们认为留日回国之后不愁出路，千钟粟与黄金屋至足诱人。但家庭考虑的除这些外，更关心的是确否有官费待遇和能否取得官费的现实问题。那时候，刚好留学肄业于东京美专的许敦谷先生回乡过暑假，我们亲去拜望他，打听留学日本的具体情况，证实日本一些高等学校确有官费生名额，家庭听了吃下定心丸，我们东渡之计才得以落实下来。

（吴玉德《留日杂记》1988第849-850页）

3. 钱歌川的留学动机

钱歌川（1903-1990），原名钱慕祖，湖南人。钱慕祖于1921年留日，1922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文学系，1927年毕业回国。与田汉相同，钱歌川回国后先工作于湖南，而后到上海工作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钱歌川曾任职于武汉大学和东吴大学。在1947年前往台湾并成为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尽管钱歌川声称自己并非出生于富裕家庭，他的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要远远好于他所说的。钱歌川的父亲是当地的县知事，而他的三个哥哥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钱歌川东渡日本之前，钱歌川的大哥正就学于长沙医学院，二哥正留学于东京高

等工业学校，而三哥正留学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正是钱歌川就读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二哥鼓励他到日本留学。⁶¹在钱歌川的回忆录中，他提到了他决定留学于日本的过程：

我的二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去了日本游学，并已考取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关于我的前途，父母写信去征询他的意见，他回信说，如果我在国内没有学校好进，就去日本读书吧。因为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订有合约，我国留学生只要考取指定的日本四个学校（帝大预科的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之一，就可以获等该生本省的公费。这合约还有两年期满，我去了日本如努力用功的话，便可在满期之前考取公费。我父母认为这是我的一条大好出路，因为我家境清寒，没有钱让我们兄弟四人上大学，现在有公费可图，不要自己花钱读书，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而且去日本读书，有二哥在那里照顾我，父母可以放心。于是，我就决定去日本了。

（钱歌川《苦瓜散人自述》1990第5-6页）

于钱歌川而言，留学日本的决定同样受到了家庭成员的影响。而与田汉负责留学生事务的舅父不同，钱歌川的哥哥作为“五校特约”的受惠者之一，以自己的经历鼓励着钱歌川前往日本留学。

通过上述三位留学生所回忆的经历来看，促使他们东渡日本留学的原因主要有三个：1）来自家人或者家庭的熟人的留学经历激励；2）中国政府留学奖学金的经济支持；3）留学日本被视作是一条好的出路。

（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入学

虽然留学日本是留学生的主动选择，而选择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则更倾向于“被动”。如前文所提及的，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五校特约”，根据条约，只要考取了条约中的五所高等学校之中的一所，就可以获得来自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而五所学校的入学考试又在不同的时间里举行，因此中国考生可以参加五所学校的考试，而对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考生来说，他们因为获得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金榜题名，不想浪费官费的名额，因此只有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进行学习。下文主要以吴玉德以及钱歌川的经历为主进行分析。

吴玉德和钱歌川都提及了中国留学生参加五所高校入学考试的过程：

上述各高等学校（五所学校）⁶²每年各录取中国留学生四十名。学年是每年四月一日开始，每学年分为三学期——四至七月，九至十二月，一至三月各位一学期。入学考试在三月间举行。五个高等学校招考官费生的日期互不相同，所以留学生可以换校报考，也就是每年有五个考上的机会。如果五个高等学校都考不上了，那只得等明年学年开始时再投考了。

⁶¹钱歌川《苦瓜散人自述》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1990 第9页。

⁶²笔者加注。下文引用部分括号加注部分同。

（吴玉德《留日杂记》1988 第 851 页）

记得当年第一个招考的是高工，其次是高师，再次是一高，最后是千医。我当然顺序去报考，初试高工的建筑系。那个学校是每天发榜的，第一天考过，第二天如榜上有名，便可再参加考试，否则就得推出，不劳你多费笔墨了。我一连考过两天，可是到第三天榜上找不到我的名字，自知是三角考坏了。他们每天丢掉考生的这种办法，是表示有一门不及格都不行，不像我国以总平均分数为录取的标准，所以某科只考到两三分的人也能金榜题名，获得高中。

（钱歌川《苦瓜散人自述》1990 第 19 页）

而从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被动”的态度。

1. 吴玉德：“不高兴念师范”

于吴玉德而言，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显然不是第一志愿，可是因为“五校特约”的关系，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即有来自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因此虽然“不高兴念师范”但是也不愿冒险失去拿到奖学金的机会。吴玉德关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缘由摘录如下：

如果留学生考上官费，可月领日元七十五元，就可免除家庭负担，有的人每月还能节余一点汇回家中添补家用，因此留日学生唯一的希望是考上官费。至于选择那（哪）个学校，读那（哪）个系只是次要问题……

入学考试在三月间举行。五个高等学校招考官费生的日期互不相同，所以留学生可以换校报考，也就是每年有五个考上的机会。如果五个高等学校都考不上了，那只得等明年学年开始时再投考了。漳州四个报考东京高师的官费生都是两次落榜，因受经济牵制不敢进入自费的学校，第三次才考上的，所以多耽误了一年半时间。我考上高师，虽然不高兴念师范，但为官费只得放弃个人志愿，却没有勇气继续拼搏。因为如果明春重新投考志愿的学校，考不上，就会白白放弃了到手的官费待遇，时间和经济都是不能容许的。

（吴玉德《留日杂记》1988 第 851 页）

2. 钱歌川：“无所谓志愿”

与吴玉德的“不情愿”不同，钱歌川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因为考取官费的喜悦心情。然而，在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动机上，钱歌川同样是因为能够获得官费而入学，至于选择何所学校以及何种专业，钱歌川并没有过多的考量。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钱歌川与吴玉德一样，他们的入学动机持明显的被动倾向。

钱歌川的回忆如下：

当时我到日本是为考公费而来的，投考学校的唯一目的，就在公费，至于学什么专科都无所谓，更谈不上志愿，考取什么学校的公费，我就去攻读那个学校的专科，考取医校我就学医，考取工校我就学工，考取师校我就学

师范，无所谓志愿，也无所谓爱好，更无所谓性情相近，……

随即我就报名去考高师，填的志愿是文科三部，即英文系。这一下可被我压中了宝，放出榜来，赫然有我的名字在上面，而且不是像那位滑稽才子说的‘解名尽处是孙山’，离开榜末还远呢。其他两校自然不必再去考了。于是马上去向本省的留学生监督处报到，真是春风得意马蹄急，我已成为一名公费生了。

（钱歌川《苦瓜散人自述》1990 第 18-19 页）

根据他们的回忆可知，对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而言，决定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完全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至于学生自己的志趣以及对将来的规划而言，通通让步于奖学金的诱惑。

五、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三名中国留学生的留日经历，发现他们的留学决策深受国家层面的政策以及家庭成员的建议的影响。然而，深入分析他们的个体经验，我们发现他们入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完全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一看似理性的决策背后事实上反映了中国留学生入学时主体性的缺失，例如，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进入高等师范学校进行学习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自己将来即将成为教师并不抱多大的兴趣。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政府奖励留日学生的初衷在于培养优秀的人才，特别是对于入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来说，政府期待他们成为高等师范生。而在实际层面，留学生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出于偶然且呈现出被动的倾向，就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并不是为了接受师范教育或者是为了成为教师。

诚然，如经志江（2000）所述，一些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确实高等教育界发挥着他们的影响。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近代中国人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并不能简单地划归为国家之间的行为，而且并不能因为留学生归国后的实践而简单地将其看作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正是因为以往的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忽略了“人”这一主体因素，从而忽视了留学生在这段历史中真实的状态，例如他们的挣扎与迷茫，他们在历史洪流中的自我构建等等十分关键的问题。因而本研究尝试从中国留学生的体验出发，分析他们东渡日本以及入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原因。

尽管本文以三位中国留学生的经历为主分析了他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动机，这三位中国留学生的经历并不能代表所有留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留学生。但也不可否认，文中所分析的三位留学生所叙述的经历确实符合当时大多数中国官费留日学生的情况。而本文所得出的关于中国留学生是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选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而不是囿于想接受师范教育而进入学校的结论，这一入学动机会对他们的就读体验以及自我认同的构建产生怎样的影响都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说明。

参考文献

1.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1991。
2. 船寄俊雄『近代日本中等教員養成論——「大学における教員養成」原則の歴史的研究』学文社 東京 1998。
3. 二見剛史「戦前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予備教育の成立と展開 (アジアにおける教育交流—アジア人日本留学の歴史と現状) —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教育交流—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留学)『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1978a(94)。
----「第一高等学校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教育 (旧制高等学校に関する問題史的研究)」『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1978b(95)。
4. 経志江「明治末期東京高等師範学校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教育の成立」『教育学研究紀要』2000(46)。
5. 刘真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一册)》国立编译馆 台北 1980。
6. 钱歌川《苦瓜散人自述》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1990。
7. 実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増補版)』くろしお出版 東京 1970。
8. 邵艶・船寄俊雄「清朝末期における留日師範生の教育実態に関する研究：宏文学院と
東京高等師範学校を中心に」『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2003(10)。
9.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 上海 1927。
10. 寺崎昌男「中等学校の整備と中等教員の養成」『日本の教師 2/中・高教師のあゆみ』
明治図書 東京 1970。
11. 東京文理科大学・東京高等師範学校『創立六十年』東京文理科大学 東京 1931。
12. 東京文理科大学『東京文理科大学・東京高等師範学校高等師範学校一覧』東京文理科大学 東京 1939。
13. 田汉<离乡的哀愁> 筱梅编《田汉创作选》仿古书店 上海 1936。
14. 吴玉德<留日杂忆>《漳州文史资料第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 漳州 1988。
15. 山田浩之「高等師範学校生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戦前期日本における中等教員像の
形成」松塚俊三，安原義仁編『国家・共同体・教師の戦略：教師の比較社会史』昭和堂京都 2006。
16. 张向华编《田汉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 1992。
17. 周一川「中国人女子留学生を受け入れた官立三校について」『史学』1997(67)。
----『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2007。